

对话与跨界:作为方法的经济史

——“三校一所”经济史学术沙龙综述

沈 博 李一苇 王嘉乐

2023年11月18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三校一所”经济史学术沙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孙洽方报告厅成功举行。本次沙龙由“三校一所”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承办。来自四家主办单位及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对话与跨界:作为方法的经济史”的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与会学者就经济史研究的视野和方法议题,或从学术史和学科史的视角进行梳理、回顾和评述;或结合特定文献史料,通过思想对话和理论解读等方式,分享民间契约文书、农村合作社运动、传统贫富调节、工业化建设等议题的最新成果;或依托各类历史数据,将量化分析运用于经济史研究,分享财政史、农村家庭财富结构、女性史等领域的前沿成果。

一、学术史和学科史的回顾与评述

近数十年来,作为交叉学科的经济史学取得了长足进展。梳理过往相关领域的学术发展源流和分野,厘清经济史学科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方位和角色,将有助于推动经济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南开大学王玉茹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隋福民研究员、南开大学关永强教授和雷鸣副教授分别从学术史和学科史的视角出发,对经济史学科发展的相关议题进行回顾和评述。

王玉茹教授聚焦于经济史研究的多学科视角。她指出,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在20世纪前期引进西方史学和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后逐步形成的。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史研究与国际经济史学界的融合程度更高,更多的理论和方法被引入和运用。王玉茹教授以滨下武志教授的研究经历为例,并引用吴承明先生“史无定法”的名言强调,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不在于追求方法与范式,而在于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与发掘。只有最适用于研究对象及所处历史阶段的方法,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隋福民研究员简要回顾和反思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研究的细密化、碎片化趋向,强调大历史视野在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大历史视野亦即扩张历史研究的视野,在更长的时间与更广的空间内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议题。除时空范畴的扩展外,大历史视野还体现在方法论上的包容性,即以开放的眼光融汇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过,他也指出,若无法将细节或局部放置于历史整体架构中,必将折损学术研究的价值。

关永强教授从历史的视野探讨经济学数学化的过程与原因。他认为,古典经济学数学化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并非由经济学家主观造就,而是由社会环境形塑的。在经济学数学化革命过程中,绝大多数使用数学方法的经济学研究,可划分为国民经济核算、线性规划、联立方程组模型、一般均衡和博弈论五类。数学化方法在经济学领域的兴起,与大萧条的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等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政商关系、经济学教育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规训,稳固了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主流地位。

雷鸣副教授通过追溯经济史的学科发展史强调,经济史学本就具备跨界与对话的“基因”。他总

[作者简介] 沈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邮编:100836。李一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邮编:100836。王嘉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邮编:100836。

结了学术交流中出现的“不对话,无跨界”、“有对话,无跨界”、“无对话,有跨界”和“有对话,有跨界”四种现象,并指出,惟有以深入的跨界研究经验为基础的学术对话,才能营造良好的交流氛围。尤其是有鉴于国内经济史研究中新制度主义经济理论与量化分析方法在过去若干年的发展历程,他认为,“不跨界无对话,要对话先跨界。”

二、研究视野和理论的“跨界与对话”

从学术史和学科史的视角看,经济史学有经济学和历史学两大学科研究范式。对经济学而言,发现和证实因果关系是主要目标;对历史学而言,还原历史事实、描述历史变迁则是努力方向。然而,不能忽视的是,经济学同样有依托文献和数据还原历史的诉求,而历史学也存在借助理论探索事件间因果关系的尝试。于是,在跨学科框架下,基于研究视野和理论的跨界与对话,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北京大学周建波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魏众、赵学军和高超群等研究员,分别汇报了他们的新思考与新发现。

龙登高教授聚焦于民间能否界定产权的议题,分享了基于传统契约的产权理论思考。他指出,一系列新的研究表明,产权并不一定要由国家界定。尽管古代中国政府有鱼鳞图册等财产登记与管理手段,但由于这些登记或凭证缺乏可流转性与可交易性,故民间契约往往被视为产权凭证。“官从政典,民依私契”,是与当时社会整体发展相适配的。迨至20世纪,随着近代政府向基层渗透的日益强化,中国社会逐渐形成由政府界定产权的情形。

周建波教授从思想史视角分析了德国雷发巽式合作社在华移植的得失成败。他指出,华洋义赈会率先将德国的雷发巽式农村信用合作制度引入中国,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中农化”现象,悖离“贫富相恤”的农村信用合作理念。至于其中缘由,除购股入社的制度安排外,还在于近代中国农村缺乏现成的和雷发巽式合作社相配套的文化传统和组织网络。他认为,若要成功移植外来制度,首先要在比较的基础上选择最适应本土社会的制度,其次要对该制度进行历史考察,判定其变迁环境与未来方向,最后要重视制度环境的配合。

魏众研究员结合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梳理了中国贫富调节思想传统。他总结指出,贫富调节传统思想以“大同”和“小康”理想社会为典型目标,以民本思想为政治思想基础,以均平思想为政治正确,效率思想被置于均平思想的对立面,在宏观分配方面有富国和富民关系的讨论,在居民分配方面有均平思想和讲求效率的治生之学等思想传统。整体而言,传统的富民和均平思想,早期以简洁易懂而又高度概括的理念为特色,中后期在分析性和操作性方面更下功夫。

赵学军研究员结合“156项”建设项目研究情况,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资料与方法议题。他指出,在开展“156项”项建设项目研究时,虽说可研究的话题覆盖工业化、技术引进、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但在搜集厂史厂志、企业年鉴、档案、方志等材料时,面临不少困难。这意味着,尽管当代经济史研究资料丰富、可研究问题多样、可运用的理论方法较多,但也存在档案材料开放性受限、敏感问题较多、不少西方理论适用性较差等难题。因此,研究时应借鉴各种方法,践行“六经注我”,并在自我理论创新的基础上,追求实现“我注六经”。

高超群研究员关注“以历史为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可能与挑战。他强调,“以历史为方法”追求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外,增加历史主义的方法。历史的延续性,历史事件的单一性和相对性,以及人的历史性,共同构成了“以历史为方法”的前提假设。尊重事物发展脉络和时间线索,强调时间节点的重要意义,关注单一事件发生发展的独特因果,以呈现复杂多元为目标,则构成了“以历史为方法”的研究机制。此外,他还提醒“以历史为方法”时,应在捍卫历史真实性的限度、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历史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距离三方面保持警惕。

三、研究方法的“跨界与对话”

除视野和理论的跨界与对话外,研究方法亦是经济学和历史学既“分庭抗礼”又可相互借鉴的一

大焦点。近年来,随着大规模史料的整理出版和数据库的建设,量化历史研究正成为经济史学的一个新兴领域,为经济史研究的发展注入新活力,进一步说明了“史无定法”。中国人民大学林展副教授、北京大学郝煜长聘副教授、南京大学梁晨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胡思捷讲师,分别汇报了他们基于量化分析方法得到的新发现。

林展副教授尝试对长时段的家庭财富结构及其影响因素与抗风险能力进行估测与分析。他结合新构建的新石器时代家庭财富水平数据序列强调,地区间财富水平差异在当时就已存在,且与当代相似。随后,又结合“满铁”调查资料,通过计算农户所拥有的土地、房屋、生产工具、金融资产、牲畜、粮食六类资产的总量及其结构,展示了近代华北农村不同家庭间的财富差异。他认为,与欧洲相比,近代华北农户家庭财富结构中可用于抵御风险的种类较少,缺少应对风险能力更强的金融类资产。

郝煜长聘副教授聚焦于1785年上收州县养廉的财政改革对清代中期财政正项亏空的影响。他通过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包含“浮收”“亏空”“灾荒蠲免”等关键词的清代奏折题本的数量统计,以实证分析方法揭示了这一改革实际效果与其预期目标相悖的事实,即尽管1785年财政改革的初衷在于追求实现收支权责分离,但最终反而形成了事实上的财政双轨制。由此可见,对于清政府轻徭薄赋的学理阐释,除了缺乏国家间竞争、疆域广大、意识形态约束等假说外,还可从财政分权中缺乏对中央约束的视角进行思考。

梁晨教授重点关注中国近代女大学生所处教育环境及其选择的议题。他根据对民国大学生量化数据库的统计分析发现:当时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比例远超日本,与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家基本持平;女大学生主要来自城市家庭,且在教会大学中的比例更高;除工科外,其他专业未存在明显的男性化特征;毕业后的初次就业率较高,但整体仍受家庭和社会的双重束缚。总之,尽管近代中国女性获得教育并进入职场,通常被视为西方思潮影响下的反传统运动,但在颠覆传统之外,中国女性在教育与职业获得的诸多层面上,与西方存在诸多不同。

胡思捷讲师集中探讨了明清时期的女性生存状况问题。她选取1350—1900年间江浙地区的六个家族为样本,利用族谱中对已婚男性所拥有的女儿数量及其婚配情况的记录,估算性别偏好导致的女性超额死亡比例和未被族谱记录的成年女性规模。结果表明:存活孩子的性别比约为1.34:1;在所有应被记录的女性中,共有68.9%的女性未被族谱记录,其中47.5%的女性存活但未被族谱记录,21.4%因溺女娶恶俗或被父母忽视而早逝。不过,由于童养媳等情况,她坦承上述估算在相当程度上存在高估女婴死亡率的可能。

在自由讨论环节中,其他与会学者就经济史研究的视野和方法等议题,与主讲嘉宾进行了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魏明孔研究员结合自身经历指出,建国初期的农村合作化运动经历了从运行制度良好到实施效益不理想的转变,其中尚有诸多值得当前合作化实践借鉴与吸取的经验教训。商务部研究院彭波研究员对量化历史研究相较于传统历史研究的异同与得失进行省思,提醒学人们应注重学术研究的现实关怀。首都师范大学张天虹教授认为,历史学经典著作的意义在于其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启发性。诸如伊懋可的《中国历史之路》,其学术价值之一便在于以技术作为底层逻辑探讨唐宋变革的动力,超越了以往对唐宋变革的认识。北京工商大学陈晋文教授则指出,历史学研究的深入需要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融入和跨学科交流,而跨学科研究的推进需要更多元的理论储备和技能培养。

最后,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魏明孔研究员作总结发言。对于本次沙龙,他认为,老中青三代学者分享不同研究领域、不同研究方法的优秀成果,生动诠释了“对话与跨界”的主题。他倡议当代学人以开放的态度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并衷心期待“三校一所”经济史学术沙龙能够在未来不断发展,为中国经济史学人的深入对话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条件。

(责任编辑:马烈)